

毛泽东的 思想教育艺术

MAOZEDONG DE
SIXIANGJIAOYUYISHU

哲理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 的 思想教育艺术

哲理 著

MAOZEDONG DE
SIXIANGJIAOYUYISHU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号 02 号

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

◎哲 理 著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 销：新华书店

(430015·汉口新华下路 192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1 印张：7.5

版 次：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82 千字

印数：1—4 000 册

ISBN 7-5351-1713-9/G·1399

定价：8.60 元

如印刷、装订有错误，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序

在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欣喜地读到哲理同志的新作——《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

毛泽东曾多次说：我是一名教书先生。他一生就是在实践“教书先生”的伟大事业。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领袖、革命家和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艺术家，是人类最伟大的铸魂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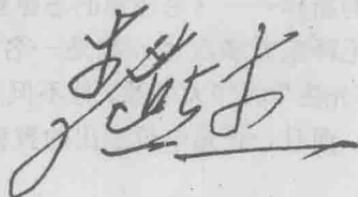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说，把思想政治教育升华成为科学与艺术。从而，形成了他的独具特色的教育艺术。

毛泽东对教育艺术有着丰富的实践和理论。他那高超的教育艺术，不但教育了与他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深深地教育着后来的人。他的教育艺术实践和理论已载入世界教育艺术的史册，定将发出璀璨的光辉！

作者是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会员、高级政工师，曾出版过教育艺术的专著和发表教育艺术的论文数十篇，其作品荣获过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的铸魂创新奖并多次在全国、省（部）获奖。他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的基本原理为指针，运用教育艺术的理论，对毛泽东的教育艺术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成功的探讨。书中不乏独特见解，是目前研究毛泽东思想中有份量的一部专著。

该书在写作上夹叙夹议，溶理论性、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为一体，它不仅为广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干部提供了毛泽东启迪人们心灵的金钥匙，而且也是广大青年进行自我修养的一本好读物。

对毛泽东的教育艺术，目前，研究的作品还不多见，作者在毛泽东的艺术大海洋里作了初步的也是可喜的探讨，我们对此表示大力支持，热烈欢迎。我们还盼望作者在探索教育艺术的艰辛路上取得新的成果。



目 录

序 (1)

对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的探讨——开篇语	(1)
毛泽东的宣传艺术	(8)
毛泽东的倾听艺术	(17)
毛泽东的斡旋艺术	(28)
毛泽东的诱导艺术	(33)
毛泽东的典范艺术	(41)
毛泽东的激励艺术	(50)
毛泽东的批评艺术	(59)
毛泽东的问话艺术	(68)
毛泽东的答话艺术	(75)
毛泽东的演讲艺术	(81)
毛泽东的讲课艺术	(90)
毛泽东的说服艺术	(97)
毛泽东的说理艺术	(103)
毛泽东的谈话艺术	(114)
毛泽东的比喻艺术	(122)
毛泽东的幽默艺术	(130)
毛泽东的双关语艺术	(138)
毛泽东的初交艺术	(143)
毛泽东的交友艺术	(148)
毛泽东的聊天艺术	(157)

毛泽东的安慰艺术	(167)
毛泽东的教子艺术	(173)
毛泽东关心人的艺术	(184)
毛泽东的用人艺术	(194)
毛泽东的思维艺术	(207)
毛泽东的释名艺术	(218)

主要参考书目	(229)
后记	(232)

对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的探讨

——开篇语

毛泽东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教育家，是人类伟大的灵魂工程师。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说，而且把思想政治教育升华成为科学与艺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他一生着眼于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心塑造一代新人，有着丰富的教育艺术理论和宝贵的教育艺术实践。

1.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教育艺术家

(1)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说。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一门科学。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伴随着共产党的诞生而产生的。不过，最初它不叫思想政治工作，而叫宣传工作或思想宣传工作。宣传工作这个概念，最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里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详细规定了共产党人从事宣传工作的任务、内容、形式和组织保证。列宁在1902年前后创立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就论述了开展政治斗争和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这一概念，强调党要“积极从事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的工作，从事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的工作。”(《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69页)列宁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对党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教育和管理体系，这标志着马列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学说已经初

步形成。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宣传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原理，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概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针、内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工作艺术，从理论上对思想教育艺术作了许多深刻的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学说。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法宝。要出色地完成思想政治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人们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以提高干部群众政治觉悟为目的政治理论、时事政策的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和情操的教育。

(2) 毛泽东对思想教育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贡献。毛泽东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一套科学的方式、方法、技巧，并从实践上升成为理论。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文章精辟地论述：“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与技巧。比如，“一般号召”和“个别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抓主要矛盾等等。毛泽东鼓励领导干部要“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了专门的论

述。比如，党委书记与副书记及委员之间协调的艺术；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与艺术；“弹钢琴”的艺术；抓工作“紧”与“松”——“度”的艺术等。

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发表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等论述方法及教育艺术的专篇。毛泽东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提出思想教育艺术问题，比如，对犯错误的同志，既要把错误思想彻底纠正，又要帮助他，挽救他；对人对事要坚持一分为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等。

2. 毛泽东思想教育艺术的特征

(1) 实践性。思想教育艺术作为一种技能、技巧，其本身就带有实践性。而毛泽东在进行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把技能、技巧运用于整个思想教育的实践中，所以说，离开实践的技能、技巧也就无所谓思想教育艺术。当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教育艺术时，便会发现，毛泽东的教育艺术产生于他的思想教育的实践中，没有毛泽东的思想教育实践，也就不会有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正如他在《实践论》中论述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所以说，实践性是毛泽东的教育艺术的基本特征。

对毛泽东的教育艺术的实践性，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其一，毛泽东的教育艺术产生于教育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教育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由产生、发展、完善，最后达到炉火纯青，这个“过程”其本身就是实践。其二，毛泽东的教育艺术服务于实践，并受到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展。

(2) 创造性。思想教育艺术其本身就是创造性的方式、方法，离开了创造性也就无所谓思想教育艺术。毛泽东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遵循它的普遍规律。但是，他不迷信马克思主义，也不迷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功经验。他指出：“我们要学

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以，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当然包括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毛泽东总是不断地寻求教育人的新方法、新技术。比如，“生命线”的提法、“党支部建在连队”、“调查研究”、“整风、民主”的方法、化消极为积极因素等等。就连“谈心”、“聊天”这些传统的方法，毛泽东都创造性地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3）经验性。思想教育艺术，如同表演艺术、雕塑艺术、盆景艺术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教育者的阅历、知识和经验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往往带有他个人经验的痕迹。比如，他的调查艺术、诱导艺术、幽默艺术等。另外，由于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他才有那独具特色的倾听艺术、聊天艺术等。这些教育艺术带有明显的个人经验的成份。

（4）灵活性。毛泽东的教育艺术没有固定的统一的模式，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因人因事而异，因地制宜，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所以，毛泽东的教育艺术总是丰富多彩。

1927年12月，毛泽东亲自处理了一起失手致死人命案。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两人关系很好。陈伯钧修手枪后，在试扳机时，失误将吕赤打死。毛泽东经过调查，并征求干部战士的意见，给了陈伯钧一个适当的处分。

1937年10月，毛泽东还处理过一起枪杀案。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老战士，到延安后，黄与刘茜谈恋爱，后来，刘茜不同意。黄克功先是持枪威逼，逼婚未遂，失去理智，开枪打死了刘茜。毛泽东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处决了黄克功。

同样都是枪杀案，但毛泽东视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对陈伯钧，毛泽东运用的是挽救艺术。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陈

伯钧英勇作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名优秀干部和高级指挥员。处决黄克功，则运用的是抓反面典型的艺术。由于坚持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处决黄克功以后，老百姓无不称颂：共产党人是坚持法制的。连那些卖力宣扬这起“桃色新闻”的反动报纸也再无话可说了。这些提高了党的威信，教育了广大干部战士。

从毛泽东亲手处理这两起杀人事件，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的灵活性。他处理问题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内外条件，起因后果，审时度势，灵活巧妙地进行处理。所以，毛泽东说，处理问题，必须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灵活性。

(5) 针对性。毛泽东在思想教育中，既注意抓普遍的带倾向的问题，又善于针对一人一事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因此，他的思想教育总是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延安时，有一次，冯家芳带着她的铁娃去看病，碰见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他们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伤寒病。毛泽东鼓励铁娃：“一共要打十针，你听话吗？”“听，听毛主席的话，一共十针。”几天后，铁娃出院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妈妈：“打了五针，毛主席咋说十针呢？”冯家芳说：“娃子，毛主席料到你怕打针，又怕你犯急性病，所以跟你说一共十针，这就是他给你打的准备针、思想针。”毛泽东针对铁娃怕打针，而又容易犯急性病的思想，把打五针，说成打十针，使铁娃有思想准备。这就是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做人的思想工作的一个例子。

(6) 启发性。启发性是按照人的思想变化的规律，针对人的思想，采取启蒙思想阐明事例的方法，引起对方联想，从而领悟事理。毛泽东研究了教与学存在着的尖锐矛盾，认为要解决教与学的矛盾，主要途径之一就是改革教学方法。于是，他提出教师的讲授要有启发性。他在《教授法》一文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教学应采用启发式，废止注入式。如何达到启发呢？一是教育内

容的启发性，要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富于哲理。二是教育语言要有启发性，语言要准确、鲜明、通俗、生动、有趣味。三是教育方法要有启发性，就是讲授道理，也不一定都讲完，有时可以点到为止，留下的让受教育者去思索；有时可以出题目，让受教育者自己去学习，寻找答案等等。

(7) 形象性。毛泽东具有浪漫的诗人才质，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毛泽东的这种个人素质也融入他的思想教育艺术之中。1921年，他在安源教矿工识字，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时，就是运用形象性的教育艺术。他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然后解释说，上边的一横是“天”，下边的一横线是“地”，中间的一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头顶着天，是顶天立地的。他要工人不要相信宿命论，要相信自己。

(8) 科学性。我们把科学性作为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来论述，是指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是建立在人的思想、行为活动的规律之上的。思想教育是一门科学，与之相适应的工作艺术也应是科学的，也就是说，要按照规律对人进行教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事并不是没有，有时是“左”，有时是“右”。为此，毛泽东指出：“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当讲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他说，有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有的人还不熟悉，也有人反对，有的人怀疑。对于这些反对、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怎么办呢？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宣传，“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这就是说，要遵循人的认识规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操之过急。

(9) 趣味性。思想教育是十分严肃的工作，但它并非与幽默风趣无缘。当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教育艺术时，常常被毛泽东教育人时的幽默与诙谐逗得捧腹大笑。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的教育艺术具有浓厚的趣味性。

一次，毛泽东叫卫士默写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的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钱，有你扰乱么。”

卫士脸直发烧，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辗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卫士是循循善诱的，又运用了幽默诙谐的教育方法。卫士在这种趣味性的教育中，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

(10) 辩证性。辩证性是毛泽东的教育艺术的核心、灵魂，是毛泽东的教育艺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毛泽东在教育人民群众中，历来是主张运用辩证法的。比如，他反对肯定一切，也反对否定一切；他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他认为万事万物及人都是会变化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先进可以转化为后进，后进也可以转化为先进；他主张并努力做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处理问题，很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他多次讲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等等。这些都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的宣传艺术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页）如何使领导、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呢？这就靠宣传教育。

革命事业需要许许多多的宣传工作者，需要宣传的专门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8页）

毛泽东曾说：一个人一旦与别人交谈，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这是对每个干部提出的要求。要求他们一旦与别人接触，就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是一位宣传艺术家。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项政策，每一个方针，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就是毛泽东的宣传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1. 理论灌输法

毛泽东在直接参加并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但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且，极为重视革命理论的宣传传播。

毛泽东十分注意革命宣传阵地的建立。在大革命运动初期，毛泽东深感急需创办一种刊物，以扩大革命宣传。1919年7月14日，经过毛泽东的紧张工作，《湘江评论》创刊号终于出版了。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在宣传革命道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革命深入发展的以后，毛泽东认识到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无法研究俄国的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湖南这块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而鉴于湖南各种新书刊奇缺的实际，创办文化书社便成为当务之急。经过毛泽东的奔波和筹备，文化书社于1920年9月9日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社“特别交涉员”。文化书社在湖南境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向着健康方向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亲任主编、创办的《政治周报》于1925年12月5日问世。毛泽东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理论。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政治周报》“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灌输的方法对干部、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在延安整风中，党中央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毛泽东提议整风之后，组织人力大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当时他说：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由毛泽东选定的十二本书，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1953年和1958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内情况，反复要求全党加强对马列著作的学习。1963年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

马列著作问题做出部署。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由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断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灌输，全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有了提高，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为宣传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做出了毕生的贡献。他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宣传，他强调灌输的长期性、准确性、系统性和全面性；他注重灌输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层次性和渐进性；他总是要求把灌输与自我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

2. 舆论媒介法

毛泽东毕生重视舆论宣传，大造革命舆论，为夺取新中国的胜利，建设新中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不但本人身体力行，毕生奔走呼号，大造革命舆论，而且善于发动所有的力量和人员，大造革命舆论，更显示出他的宣传艺术的高超。

仅从毛泽东通过埃德加·斯诺这一“媒介”，向全世界进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就可见毛泽东的宣传艺术的一斑。

1936年，斯诺第一次来到延安访问。当时，中国的革命正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然而，世界各国，甚至中国国内，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重视同斯诺的谈话，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因为，毛泽东懂得，这绝不只是他个人与斯诺一般朋友式的交谈。正像斯诺后来所写到：“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